

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 中国的两次实践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1954年12月,吉洪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进步文学”观念,并据此建构起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新体系。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被全盘接受,导致在当时中国大学的世界文学教育中,苏联文学被特殊化,西方文学被污名化,中国文学被矮化。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作家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亚非作家会议,从而将世界文学的视野扩展到东方文学,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东方文学知识系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二分”世界文学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总结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这两次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建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世界文学; 世界进步文学; 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亚非作家会议; 东方文学

Abstract: Nikolay Semenovitch Tikhonov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world progressive literature”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Soviet Writers in December 1954, around which was constructed a new world literary system with Soviet literature playing the central role. The concept of “world progressive literature” was so uncritically accepted by China in 1950s-60s that Soviet literature was exclusively valued while Western literature was denigrated and Chinese literature was dwarfed in literar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1950s-60s Chinese writers and scholars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Asian-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to expand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to Eastern literature and make preparation for the China's own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bifurcated i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by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Eastern literature. A study on two practices of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progressive literature; Conference of Soviet Writers; Asian-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Eastern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0)03-0010-9

在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系列论述中,最受重视、被引述最多的一段文字是:“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364]按照歌德的这一理解,世界文学是指各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彼此

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符合人类进化和完善的信念与追求,因此歌德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歌德在为世界文学能够“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2:43]而欢呼的同时,又念念不忘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德国人失去的最多”,而“高瞻远瞩的法国人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3:379]。这些人们惯常忽视的歌德的论述恰恰暴露了“世界文学”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承担着文学世界大同的理想;另一方面,当世界文学观念进入具体实践时,又会与特定民族的文学利益联系在一起。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实践,同样贯穿着这种二重性。本文研究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中国的两次世界文学实践,以挖掘世界文学理论的本土资源,总结其在处理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

一、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进步文学”观念

“世界进步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对世界文学进行阶级分析,以甄别出代表先进的无产阶级利益、反映人类发展方向的所谓“进步文学”。这一观念彻底颠覆了由约定俗成的经典作品为支撑、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文学体系,转而以文学的阶级属性作为划分世界文学等级的标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一观念首次明确提出和应用,是在 1954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洪诺夫为大会所作的题为《现代世界进步文学》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世界进步文学的实质、构成和使命。这是苏联争夺世界文学话语权的一个重大战略,对中国的世界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实,早在 1934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对与“世界进步文学”观念相关的一些世界文学理论已经作了初步阐释。在那次大会上,苏联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时康诺夫发表了题为《苏维埃的文学是世界上最有思想、最先进的文学》的讲话,拉德克作了题为《现代世界文学及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二人发言的核心,都是论述无产阶级—苏联文学的正统性,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领先地位。在他们对世界文学史的描述中,资产阶级文学已经走向腐败和衰落,而无产阶级文学不断壮大,最后发展到苏联文学的顶点和高潮。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邀请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中国、日本等 15 个国家的 41 位作家与会,其成员构成,“简直可称为世界作家代表大会”[4:1]。苏联高级别的文化官员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面

前阐述世界文学发展大势,充分展示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使命感和世界主义抱负。基于此,二人在讲话中,都用了相当篇幅来阐述如何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火种”传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时康诺夫寄希望于与会的41位外国作家代表:“我们坚决地相信,这几十个在这儿参加大会的外国同志,都是无产阶级作家的有力军队底核心与胚胎,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外创造出来的军队。”[4:11]拉德克认为要“特别注意资产阶级文学阵营的分裂,团结其中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者,“用吸引那正在离开资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的作家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来加强无产阶级文艺”[4:135]。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是苏联在对外部重重压力的环境下召开的。其时,苏联文学的发展也只有不到20年时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仍然有限,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未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在各个方面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大增,大国意识及统治欲空前膨胀;而苏美间的冷战,又需要苏联控制一批政治和文化上的同盟国,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对抗。在这种新形势下,创制“世界进步文学”概念,建构以本国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新体系,可谓正当其时。吉洪诺夫在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呈现了一幅苏联化的世界文学新图景。

吉洪诺夫描绘的世界文学新图景是饶有趣味的。在报告的引言部分,他将苏联比喻成“太阳”,给“苦难重重的、破坏不堪的欧洲”带来光明和希望。读者若细读报告全文,会发现这个比喻绝非信手拈来。事实上,吉洪诺夫正是把苏联文学作为“太阳”加以塑造的。在他笔下,整个世界进步文学犹如太阳系,苏联文学居于核心,它发光发热,推动其他国家、民族进步文学的“行星”围绕自己旋转。吉洪诺夫通过叙述的先后顺序,以及巧妙的措辞,划分出世界进步文学的不同层次和等级。最里层的是被苏联解放了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者列举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等国的名字。中国虽属于苏联所称的“人民民主国家”,但在苏联的世界文学体系中,它的文学和蒙古、朝鲜、越南等亚洲人民民主国家文学一道构成同心圆的第二层。第三层是东方的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这些国家并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进步文学的出现,主要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结果,并受到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共产主义建设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巨大影响。第四层是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作家的创作。作者列举的名单中,有法国的阿拉贡、艾吕雅,英国的奥尔德里奇、杰克·林赛、多丽丝·莱辛、奥凯西,以及美国、意大利、丹麦等国家的众多进步作家,他们受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但仍在为自由与和平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第五层是拉丁美洲各国文学。这些国家“正遭受着北美扩张主义者和南美压迫者的精

神奴役”，进步作家受迫害的事件层出不穷，但进步作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的斗争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聂鲁达等。

苏联文学在世界进步文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当然不是靠语言修辞来实现的，它依靠“伟大的”理论创造，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换句话说，这一创作方法是世界进步文学“太阳系”运行的能量来源，而苏联文学是这一能量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吉洪诺夫在报告中对世界进步文学体系的分层划类，是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掌握和应用的程度为依据的。在他的描述中，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正在顺利地掌握这种方法”；在资本主义各国进步作家的创作中，这一方法引起极大的注意；在那些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这种方法“能够帮助表现民族特色，吸收民族传统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并且“给进步作家以牢靠的武器去反对反动的外来形式的侵略”[5:280,314]。吉洪诺夫进一步指出，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发挥的“能量”推动作用，苏联文学同世界进步文学的其他部分之间，还依靠牢不可破的友谊紧紧结合起来。这种团结表现为苏联大量出版其它国家的著作，以及访问交往的增多。至此，世界进步文学的“太阳系”宣告完成。

吉洪诺夫的报告充满苏联式的霸气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是惹人反感的。但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杀，国际交往与合作只能是向苏联及其盟国“一边倒”，在文化上也不得不唯苏联马首是瞻。因此，对于苏联提出的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世界进步文学”概念，我们是全盘接受的。在此次大会上，周扬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发言，他呼应吉洪诺夫的报告，盛赞苏联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这种文学“给了全体进步人类以光和热，以温暖和力量”。他用古语“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来形容苏联文学与世界各国进步文学的关系，承认苏联文学“是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同时强调苏联文学是“我们学习的范例”，而中国作家是苏联作家的“年轻兄弟和学生”[6:328 - 335]。可以说，周扬的讲话的确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对待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真实态度。翻译家、批评家辛未艾在 1957 年《文艺月报》发表文章《苏联文学——世界文学的主潮》，把苏联文学的意义扩大到整个世界文学领域，认为苏联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文章中，他指出苏联文学在革命性、人民性、党性，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方面的“先进性”表现，用以和“腐朽”、“反动”、“落后”的西方文学进行了对比，以加强自己的论据。到 1959 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茅盾率团出席。他在贺词中，仍然坚持认为，“苏联文学是全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在四

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苏联文学为世界进步文学创造了珍贵的财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创造的经验。”[7:684]

把苏联文学奉为世界进步文学体系的核心,意味着承认中国文学的地位是从属性的,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众多“行星”中的一颗。这样的自我定位虽然低调,但在1950年代的特殊条件下是适宜的;同时,这也是对五四以来,尤其是1950年代上半期中国新文学发展所受俄罗斯—苏联文学巨大影响的体认,因而在接受上不仅没有心理障碍,而且投入了极大热情。1959年由新华书店编印的一本名为《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的小册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苏联文学的这种热情。小册子中既收录了茅盾、巴金、老舍、叶水夫等作家、翻译家的短文,也收录了不少普通读者的言论,大家众口一词,向苏联文学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对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进步文学观念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还据此改变了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教育的体制。1949年前大学国文系开设的世界文学类课程,绝大多数都是“西洋文学”或“英国文学”,偶尔有“日本文学”。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所著的世界文学史类著作,也只包括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忝列其中,苏联文学则遭到排斥。从50年代至1966年,随着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进步文学观念的确立,苏联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1954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规定在中文系本科第三、第四学年讲授外国文学,总计200学时。其中第三学年讲授欧洲文学,共90学时;第四学年讲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各占一学期),共110学时[8]。1956年8月6日至18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审定文史系科的20种教学大纲,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也在审定之列。同年11月,教育部印发这次讨论会的意见摘要,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建议是:“二年级学苏联文学,每周2学时;三年级学古代到18世纪欧洲文学,19世纪欧洲文学,每周4学时;四年级学19世纪俄罗斯文学,每周三学时。”[9]考虑到苏联文学的历史只有短短40年时间,它所占的课时数可以说已经非常可观。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编过一些世界文学类讲义和参考资料。从体例上看,俄苏文学与西方文学各自为政,互不关联。如穆木天在1956年编写的《世界文学基本讲义》(华中师范学院印刷厂印行)不包括俄苏文学,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也不包括俄苏文学。俄苏文学自成系列,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及苏维埃文学参考资料》(1957年)、《十九世纪俄罗斯及苏联文学讲义》(1958年)等。如此处理,一方面说明苏联文学的分量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学

者对如何用世界进步文学观念整合欧洲文学与俄苏文学,还没有提出成熟的意见。

世界进步文学观念同样被应用到从古希腊至现代的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教学中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的阶级划分进行文学史分期;挖掘文学的阶级认识价值;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学史描绘成资产阶级文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萌芽、发展、壮大的历史;把经典作家的整体创作分解为进步性与落后性、先进性和反动性的矛盾二重性;突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进步文学;将现代西方文学指斥为“颓废文学”、“色情文学”,等等。阶级甄别的扩大化和绝对化,彻底改变了世界文学的面貌,也走到了世界文学理想的反面。

二、世界文学观念的东方维度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世界文学观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一系列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它将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扩展到东方文学。

在 50 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变化。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尤其是 1956 年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之后,中苏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国际共运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两国关系开始降温。与此同时,在美苏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以 1955 年万隆会议为标志,以不结盟、反帝反殖民相号召的第三世界力量崛起。新兴中国在外环境变化的压力和挑战面前,开始逐渐调整国家的外交定位,把目光转向亚非第三世界,希图通过支持和参与亚非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来摆脱苏联控制和美国封锁,寻找新的国际发展空间。中国作家对亚非作家会议的支持和参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支持和参与也必然成为中国外交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 年 12 月,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在新德里召开,中国派出以文化部部长、作协主席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和东亚、中亚各共和国的代表建议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下一次亚洲作家会议,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根据 1957 年 12 月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的倡议,酝酿中的这次会议扩大了范围,纳入了非洲作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首届亚非作家会议于 1958 年 10 月在塔什干召开。来自亚非 4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位作家代表与会,中国方面派

出了21人组成的代表团。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的决议”,发表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1961年3月,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1962年2月,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来自亚非45个国家的200多位代表出席。中国方面由茅盾率11人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通过了“总决议”、“致全世界作家呼吁书”等重要文件。1966年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但由于国内政治形势丕变,中国作家的参与到1966年基本结束。

中国作家发表的有关亚非作家会议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称道亚洲和非洲文明的优越性,认为她们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亚非各国文化自古关系密切,丝绸之路把彼此紧密连接在一起。近代亚非地区的落后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当代的亚非人民正在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众口一词的表述暗含了区域共同体的概念:在地理上比邻而居,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彼此间的文化相互影响,近代的命运相似,当代的使命相同。事实上,亚非各国,不仅文化、宗教、历史、种族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在亚非作家会议上,一些大国作家因为领导权及路线问题也常起争执,意识形态上也高度戒备。但中国作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一律掩饰了不和与差异,大唱团结、合作的赞歌。可以说,正是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需要驱动下,亚非区域观念、东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重要一极的观念隐然成型。

周扬在塔什干会议上作的《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报告,在阐述东西方文学关系时,就表达了强烈的东方文化本位意识。他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摧残、毒害和歪曲;通过引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以及伏尔泰关于东方的论述,来论断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呼吁亚非作家为建立民族新文化和发展各国文化交流而奋斗。周扬在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新文学方面的经验。他强调,中国在学习其他民族文化时,“首先是学习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邻邦苏联的先进经验”,因为他们的新文化“把我们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的新的高度”。他又说:“在我们东方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和复兴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正在以一日千里之势向前迈进。”[10:66-67]不难看出,周扬的这些文字其实含蓄地表述了中国新文学的正统性以及东方文学中的先进性,并试图在亚非文化交流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参加过塔什干会议的诗人袁水拍在其文章《让塔什干的火炬永放光明》中,评价了会议之于东方文学复兴的意义:“许多作家认为塔什干会议标志着东方文艺复兴的开始,并且认为这个文艺复兴将使欧洲过去的文艺复兴相形见绌。应该说,这绝不是过分的估计。”[10:143]参加过塔什干会议的作家杨朔在其文章中,明确将亚非文学史视作世界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次会议确实可以称作人类文学史上的一场大丰收。那么多具有代表性的亚非作家,有许多来自曾经是人类幼年期的文化摇篮地带,互相交谈,互相报告着本国的文学情况,汇集一起,仿佛是一本光彩照人的亚非文学史,而这就形成世界文学极其重要的一部分。”[11:516]

对亚非作家代表大会的积极支持和持续参与,把中国人的目光吸引到东方,带动了翻译和介绍亚非文学的热潮。以当时唯一专门发表文学译作的杂志《译文》(1959年1月改为《世界文学》,1966年以后停刊)为例。此前,该杂志的重点译介对象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在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召开之后,《译文》大幅度增加了亚非文学的译介,先后推出了“亚洲文学专号”(1957年8月号)、“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958年9、10月号)、“越南文学专号”(1964年10月号)等,以及“埃及文学特辑”(1957年1月号)、“悼念日本作家德永直”(1958年4月号)、“塔什干精神万岁”(1959年1月号)、“黑非洲诗选”(1959年4月号)等专辑。另据统计,1953-1966年间的《译文》杂志,共发表亚非各国文学作品和评论634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在1957年后10年间发表的。而1953-1966年间,《译文》杂志发表的俄苏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作品及评论也才636篇,发表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只有588篇。对比之下,亚非文学译介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是令人惊讶的。茅盾1958年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1949-1958年的9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了267种亚非国家文学作品,总印数达到500万册。在1962年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所作报告中,茅盾提到近十年中,中国翻译出版了20多个国家400多种作品。这些数字说明了亚非文学翻译出版的速度和数量。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经过国家文化管理部门的系统规划,以及各大出版社、杂志社的大力配合,亚非文学作品中译本及研究资料缺乏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东方文学的内涵日渐充实,细节也更加丰富。

从1956年开始,亚非文学进入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意见摘要,其中就有“逐步创造条件,开设东方文学专题”的意见[9]。1958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师生编写的《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印行,这个大纲涵盖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1959年,北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选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大约从1958年到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教师,开始编写东方文学史讲义,并应用于课堂教学。其间,东北地区部分高校还合作编成了东方文学教材。但由于文革开始,这部教材没有能够正式出版。从上述教学大纲和部分讲义看,其中对东方文学史意义、特点、范围、分期的认定,与万隆会议,尤其是亚非作家系列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文化领导层有关亚非文化、文学的论断是一致的;或者说,东方文学大纲和讲义就是这些论断的具体化。这是中国的东方文学史知识体系的雏形,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二分”世界文学史体系的发端。

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两次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完全抛弃世界文学观念的既有规则,将苏联文学特殊化,把世界文学意识形态化,这条道路前苏联没有走通,事实证明对中国文学的世界发展也是有害的。而当中国的视野转向东方文学时,真正具有建设性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了。“东西二分”的世界文学观,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并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找到了很好的着力点,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学的自信心。这份历史遗产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德]歌德. 歌德谈话录[A]. 朱光潜译. 朱光潜全集(第17卷)[Z].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 [2] [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
- [3] [德]歌德. 论文学艺术[M]. 范大灿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4] 国际文学——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汇刊[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39.
- [5] 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 [6] 周扬.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A]. 周扬文集(第2卷)[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7] 茅盾. 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A]. 茅盾全集(第33卷)[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8] 见教育部档案 98-1954-Y-75.0002.
- [9] 见教育部档案 98-1956-C-111.0007.
- [10] 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 [11] 杨朔. 寿亚非作家会议[A]. 杨朔文集[Z].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